

# 关于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几个哲学问题

陈祖华

本文着重就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几个哲学问题,论述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作者认为,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哲学精神,对于进一步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理论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1、论文从认识的主体性及其与客观性的关系的角度,深入论述了解放思想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2、论文阐述了生产力标准的本体论意义与价值论意义,以及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相互关系。3、论文从文化学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论述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与姓资姓社的问题,论述了健全民族文化心理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邓小平同志年初的南巡讲话,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它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国在新形势下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辟论述与创造性发展。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哲学精神,对于进一步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理论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哲学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学术界的朋友进行讨论。

## 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与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自1958年以来二十年“左”的失误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这条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随之而展开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实事求是本质上包含解放思想的含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就意味着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着的发展规律出发,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本身就是对原有思想的解放,对种种不符合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思想、观念的抛弃。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当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突出解放思想的作用,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规律办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他的多次讲话中经常提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解放思

想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实际”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事物及其发展规律都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反映出我们认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规律要靠人去探求。客观事物是一个多测度、多层次的、发展着的存在，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主体（政党、阶级、群体或者个人）的认知图式与理论框架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客观规律把握的状况。这鲜明地体现出认识的主体性。

以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为例。在我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是一个中国，同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在具有不同认知图式与理论框架的代表人物的头脑中，反映出来的状况却很不一样。陈独秀的看法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工人阶级力量弱小且很不成熟，因此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了以后再次进行革命才有可能。这就是陈独秀基于对中国国情认识而提出的所谓“二次革命论”。另一种看法是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的看法，他们看不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反动势力在城市里很强大这个基本事实，一味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主张。与这种看法不同，毛泽东同志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把握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从而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是面对一个客观对象，为什么得出的结论却如此不同？从认识论上说，这主要是由于主体性因素的差别造成的。陈独秀的认知图式与概念框架滞后于世界革命历史进程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认知图式与概念框架基本上是俄国式的，无法认同有别于俄国的特殊国情。毛泽东的认知图式与概念框架是开放性的，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因而能如实地反映中国的特殊国情，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的转变，再次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课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把握得是比较准确的，因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搞得比较顺利。但后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渐渐离开了中国国情，出现了不少的决策失误。党的十三大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认，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深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战略步骤的选择与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离开了中国的现时国情，而党的十三大报告却能对中国国情形成正确的认识呢？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认识论因素仍在于认识主体的认知因素与概念框架。毛泽东的主体观念是完整意义上的阶级、阶级斗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不间断革命。而新时期党的领导集体的主体观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由此可见，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与理论框架如何，对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认识主体的观念滞后于认识对象的发展，就会极大地妨害对客观规律的把握，那怕是在明确宣称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情况下，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国以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连续失误就是如此。

本来，自1956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完整意义上的阶级已逐渐不复存在。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框架却仍然没有变化。先是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阶级斗争的战场从党外移向党内，进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接着便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最后则形成了系统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什么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会愈演愈烈？从认识方面

说,首先是因为主体完整意义上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所造成的“先验的统摄统觉”及其向认识对象的投射;接着是由于由此而产生的主观主义感觉材料对主体完整意义上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的“确证”,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加强,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种从僵化的观念到错误的实践,再从错误的实践到更加僵化的观念的怪圈。

江泽民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精神。正是由于解放思想,才使我们从延续达二十年之久的完整意义下的阶级斗争的怪圈中走出来,把握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正是由于解放思想,才使我们摆脱了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观念的长期困扰,认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当前,有些人之所以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发展问题上存在思想疑虑,放不开步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囿于原有经验形成的发展观念。他们觉得,建国以来的经验证明,比较合适的发展速度是百分之四、五、六,速度再高,就有可能出现经济过热、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现象。诚然,我国以往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这些同志不了解,那是在我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必要的教训应该记取,但那样一种发展速度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现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实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这与过去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次,在全方位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较多地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吸取国外的一切优秀成果。再者,科学技术发展是跳跃式的,大胆引进、吸收和采用先进技术,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等,在经济上都出现过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这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只要我们认真注意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注意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注重农业的建设与发展,我国也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个较快较好的发展时期。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破除基本处于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发展观念,要认识和把握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的发展规律是根本不可能的。

总结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我国每一次的大发展都是与思想的大解放分不开的。不解放思想,就难以实事求是,就难以多测度、多层次地发现与把握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把我们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同样也是我们从斯大林模式、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思想桎梏中获得解放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都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开拓进取,才有可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看起来道理很简单: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依赖认识主体去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认识主体在探求事物发展规律的时候,又总是在一定的、先在的理论与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不可能是一块“白板”。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先在的理论、观念与客观对象及其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常常会出现不一致或不尽一致的情况。因此,不断地破除认识主体中那些先在的、同客观对象不一致的理论观念,便成了多测度、多层次地把握不断发展着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必不可少的条件。用我们常用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思想的不断解放。说到底,解放思想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需要,是认识论的一条重要要求,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要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其实质在于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一致。反对思想僵化和主观主义。

## 二、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

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到生产力标准问题的提出与再次确认,是生活对哲学的呼唤。

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是在否定两个“凡是”,反对个人迷信,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理解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即人们的认识是否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相一致的问题,或者说是判断认识真假的问题,属认识论范畴。通过实践标准的讨论,使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

然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表明,光有实践标准的讨论是不够的。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和种种空想尚在阻碍着我们的前进步伐,有待于进一步破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标准问题被提了出来,历史再次把一个哲学问题召唤到了生活的前台。

生产力标准就其被提出时的本来涵义大致有两个方面或者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是它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本体论意义;一个是它作为衡量我们路线、方针、政策的利弊得失的标准的价值论意义。前者是说,唯物史观确认,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的地位,并在这个基础上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保证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后者是说,衡量一个政党政策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是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社会主义所要求或允许,反之则不是。上述两个方面的涵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一个方面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要求,后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衡量路线、方针、政策利弊得失的标准。

生产力标准问题被提出来以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有些问题似乎清楚了,但有些问题似乎还不那么清楚,同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生产力标准的再次确认,又一次激起了生活的浪花,它使人们在新形势下更为深刻地感受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第一,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发展,对于清除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和种种空想已经和正在起到重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使人们从空想回到了现实,从头足倒立转到了把双脚站立在大地上。第二,邓小平同志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力标准的论述,使人们的思想,特别是价值观念,获得了又一次大解放,对人们的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价值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既然衡量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失利弊的主要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而一切符合于上述“三个有利”的做法,就理应当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和允许的范围。这样一来,不仅使我们在确立战略目标的时候更加注重人民的实际利益,而且在实现目标的手段的选择方面,也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余地,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智慧。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因为生产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所以生产力标准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对于这样一种理解,我想提出以下几点与之进行讨论。首先,生产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属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社会实践范围,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实践不是一回事,把生产力等于生产实践,这在逻辑上是有困难的。生产实践指的是人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对自然的改造,而生产力指的是人改造自然的能

力。生产力标准就其被提出来的时候的最初涵义,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第一种涵义讲的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一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或者这一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用,它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问题不是一回事;第二种涵义讲的是衡量路线方针政策利弊得失的主要标准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问题也不能划等号。这说明,生产实践,生产力,生产力标准三者的涵义是不同的。第三,把生产力标准说成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看起来好象是重视了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认识论意义,客观上却忽略了它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论意义。

这样说,是不是断定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没有联系呢?不是的。实际上,一个具有真理性的事实判断也具有价值属性。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价值是事物对于人的意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疑也会给人们带来利益。所以我们说,一个真理性的认识是具有价值的,一条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路线,一项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政策,等等,是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利益的。同样,价值判断也有真假问题。例如,广泛地吸取外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是真是假?可以依据社会实践进行检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真的价值判断。由此可见,不仅认识的真理性的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的检验,价值判断的真理性的认识也依赖于社会实践的检验,认识论问题与价值论问题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确认生产力标准的价值论意义,或者那怕是部分地确认这种意义,那我们就可以说,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同样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统一起来了。如果我们能在这一过程中既解决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又解决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性,那我们的事业就会得到飞速的发展。

### 三、关于“姓社姓资”与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两极化世界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展开了长期尖锐的搏斗,以致出现了苏联、东欧形势的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容易看到二者之间的对立是可想而知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论述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在历史提供的机遇面前,富有胆识地重新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则,并把它同加速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与思路,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民族文化心理健康化的表现。

众所周知,我国近代史是一部倍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的历史,是一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史。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不断遭受侵略与压迫的苦难历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在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一步一步地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不同层面。从最初感受到的“船坚炮利”到对自然科学的介绍,从倡导变法维新到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扬和对经验论科学方法的提倡,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认识的大致历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既学习科学技术,也学习社会学说,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毛泽东思想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毛泽东同志在对待人类文明的问题上,为中华民族建构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

本框架是：①熔铸中西的文化观。毛泽东同志既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也批判了“全盘西化”的做法，主张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熔铸先进的新文化，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②重视实用与功利的文化价值取向。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突出了革命的功利主义的意义，反复阐述了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古人、洋人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③豁达大度的文化心态。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勇于吸取外来文化的民族。毛泽东同志在发扬民族精神的基础上，造成了一种豁达大度的文化心态。它既不妄自尊大，也决不妄自菲薄，它敢于面对外来文化，同时也自信有能力消化和吸收。当然，毛泽东同志一生是在紧张的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度过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基本处于封闭状态的情况下度过的，不可能不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带来影响。邓小平同志不仅看到了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也看到了从两极化向多极化的演变，实现了从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系列论述，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代表了一个全面走向世界的伟大民族的文化心理，一个健全的而不是羸弱的、自信的而不是自悲的、勇敢的而不是怯懦的民族心理。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不要害怕，而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在吸取外来成果发展我们国家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呢？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问它是姓资还是姓社呢？当然不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问题，物质文化的众多领域，尤其是工艺技术，体现于其中的人与自然的作用方式，是各国均可以广泛吸收和借鉴的。广义的制度文化，包括制度、体制、管理方式、社会事务的参与形式等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领域。其中，所有制形式，政权的性质及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确认上述内容的法律制度，带有鲜明的阶级性质。但在劳动组合方式、管理方式、社会事务的参与方式等方面，情形却有不同，同样存在着我们可以广泛借鉴和吸取的东西。精神文化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从总体上说是社会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也存在着可以通过认真的分析、鉴别，进行批判性吸取的内容。由此可见，并非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有些问题，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国家政权的性质，等等，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有些问题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如自然科学，技术，工艺，等等。商品，市场，自奴隶社会以来已经出现，因而也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姓资姓社，争论清楚了才去办呢？应该说，只要我们在一些大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弄清楚了，坚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就不要再去花许多精力与时间搞清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邓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这是一个富有理智的、现实的、务实的考虑。如果我们在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来它一场无休止的争论，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现在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被“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所束缚，就会迈不开步子，贻误宝贵时机，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这些问题也或多或少地与文化心态有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心理的变化是一个国家众多变化中居于深层地位的变化。如果我们的广大干部与群众能在新形势下，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一种健全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那将会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带来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